

退休那年,本可在家安享晚年的谢臻嵩带着一批退休教师建起贵州织金县首家打工子弟“爱心小学”;如今,已是75岁高龄的他仍然工作在三尺讲台;受到感动的当地政府收编这家学校为公办校“正规军”……

“痴迷”教育的古稀校长

本报记者 李丰 赵福中 文/图

说到年逾古稀的谢臻嵩老人,贵州织金县当地老百姓的谈论总会突然窜到一个兴奋的“极点”,一连串故事滔滔不绝,家喻户晓。1994年,谢臻嵩退休后带着一帮老教师白手起家,开设了织金县第一家农民工子女免费就读的“爱心小学”。时光荏苒,20年后,这所凭着“慈善”、“募捐”之力办成的小学一举突破了1400名生源规模,接纳了织金县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就读。老教师们的行为感动了政府,2007年该校被收编为正式的公办学校——织金县第七小学。8月30日,记者来到该校,见到了已年逾古稀的谢臻嵩老校长,此刻的他精神矍铄地站在6年级的讲台,正为50多名农民工子女教授语文课……

退休办起“爱心小学”

谢臻嵩对教育的“痴迷”早就出了名。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担任织金县城关区学办主任时,由于他所辖片区没有中学,当时农村孩子到城里读书要多交10元钱,他考虑到农村孩子条件差,难以就读中学,便萌生创办一所中学的念头。多方奔走,组织上划拨10万元作为新学校的筹建经费,他用这10万元购买建筑材料,同时向社会各界申请援助。为了节省开支,他白天在学办工作,晚上牵着一条狗到工地成了看守工人,甚至叫家里人到工地上无偿打小工。就这样,一所崭新的学校终于落成。随后短短几年时间,他竟然培养了30多个大学生,打破了全区没一个大学生的尴尬局面。这所学校,就是现在拥有几千学生的织金县第四中学的前身。

同样,对待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谢臻嵩也有着类似的“痴迷”。1994年,织金县各类非公企业越来越多,他发现随着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增多,很多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却无法入学。有的孩子也没有家长管教,整天在街头游荡。他调查后发现,县城公办学力量不足,导致农民工子女无法入学。谢臻嵩不由得心生焦虑,便找来曾经和自己一起工作过的退休老教师们商量,“我们大家虽然退休了,但还能为社会再做些事,办几个班让这些娃娃有个去处。”这个提议得到了退休老教师谢洪芬、陈元良、赵仕泽等人支持。很快,这些热心的老教师们就开始串寨子调查了解情况、筹备工作。

两手空空,没钱、没人、没地,这学校该怎么办?谢臻嵩找到县烟酒公司的熟人,借来一间废弃的烤酒仓库,自己出钱将仓库



75岁高龄的谢臻嵩正在为农民工子女教授语文课。

隔成五间。他和搭伙的老教师去棚户区挨家挨户拜访农民工家庭,先后跑了20几个村寨。只要发现孩子没上学,就千方百计做家长工作。他面向社会招聘教师,凡是能上课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来。没有课桌凳,他就凭着自己“脸熟”到县城各个学校求赞助,织金一小要了40套,织金三中校长是他的学生,除了赠送之外,还把淘汰下来用了几十年的“苏式连体式桌椅”全都给了他。他还从水泥厂要来木方板,用砖头搭起来给学生做课桌。很快,他们就招来了124名学生,分成两个班,取名叫织金县西瓜洞片区“爱心小学”。

民办学华丽转身

由于不收费,加上老教师们授课认真负责,谢臻嵩的“爱心小学”渐渐名气大了起来,农民工纷纷带着孩子慕名而来。第二学期,他们的生源几乎翻了一倍,招到了380名学生。看着这些孩子,老教师们满心欢喜却又充满忧虑,靠什么支撑起这么大的学校?

无奈之下,谢臻嵩只得取消了免费政策,向每个孩子每学期收取45元的书本费。家庭实在困难交不起的,依然可以免费就读。孩子们没有活动场地,他决定将收取的微不足道的经费平操场,修厕所,去贵阳市找学校赞助旧校服……为了节省经费,

学校的老师从来都是从家里自带午餐,省下钱来支持学校增加教学设施。谈起学校当年的困难,参加办学的退休老教师谢洪芬几度哽咽。一次,学校和县里其他部门准备搞庆“六一”活动,孩子们排了几个舞蹈节目,可是买不起音响。她只能带着孩子们在台下的一个角落“躲着”出席活动的县领导,用清唱伴奏。台下孩子穿着各式各样的校服,花花绿绿,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县里面几个学校在搞大联欢。看到这样,在座有的领导忍不住落泪了,一位领导马上掏钱给学校配齐了音响。

“爱心小学”得到了织金县委、政府和教育局的高度重视。2005年,时任织金县县长的朱永德多次对“爱心小学”进行考查,商讨学校未来发展。县里最终拿出方案:政府征用土地给“爱心小学”,再出资50万元经费,空缺资金由谢臻嵩自行筹备,自行经营,自负盈亏,学校最终产权归



为了让农民工子女有学上,谢臻嵩到村民中进行动员。

他个人所有。当时有的老师赞成这种做法,可谢臻嵩却“一票否决”。他提出了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方案:学校由政府修建,他暂时替政府管理学校,一切财产都属于政府。老人的说法是,“学校是国家的、是政府的,不属于我谢臻嵩个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所选择的事业就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最后,经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重建“爱心小学”并纳入政府管理,和其它县直小学同层次接受考核,并于2007年正式更名为织金县第七小学。就这样,在他和当初的13名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最初仅有100多名学生的“爱心小学”发展为今天在在校生1400多人的公办学校。同时,一位台湾慈善家为学校捐款50万元,将学校从西瓜洞片区搬到了人影山。

2011年,学校刚有起色不久,又遇到县城旧城改造,无奈之下,谢臻嵩几次找到县教育局领导,借来织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空闲校舍,和聋哑儿童一起开课。直到今天,第七小学自己的校舍依然在建设当中。为了早日让孩子们有崭新的校园,他经常背着几斤包谷酒去附近村民家作思想工作,谈搬迁事宜,几个月内喝掉了200多斤包谷酒。

“古有孟母三迁,今有七小三迁,为了孩子们的将来,值了。”谢臻嵩笑着说。

“行知精神”感动众人

政府虽然给了谢臻嵩校长的“头衔”,可他却依然坚持像一名普通教师一样,写教案、备课、讲课,现在他还担任着6年级的语文老师。生活中,他就像一个慈祥的爷爷,给孩子们最悉心的照顾。

有一年,谢臻嵩的女儿给他寄来5000元钱。谢臻嵩收到钱后,马上将这笔钱买成童鞋,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六一”儿童节。女儿要接他去外地安享晚年,他却对女儿说:“我热爱我的教育事业,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决不会离开讲台。”

每逢过年,谢臻嵩总带着老师们走访学生,为他们送去新年礼物。给垃圾袋家庭的孩子发压岁钱,鼓励他们要立下志向,对生活充满希望。每当发现街头巷尾有儿童辍学,他也一定想办法让他们重返校园。

一次,谢臻嵩在菜场发现有3个十几岁的孩子捡垃圾烧火取暖。他走过去询问,得知孩子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妈妈已经过世,父亲长年卧病在床。他立即带着几个孩子找到他们的家,原来不是三个孩子,而是五个。回到学校,他找到班主任老师无论如何要把这几个孩子都收进学校来读书,并时常给他们送去衣物和米、油等食物。2010年,孩子们的父亲与世长辞了。谢臻嵩跑了三次省城,联系到义工组织把这几个孩子送到北京读书,期待他们能早日成才。

“谢校长和学校的老师们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家住织金县猫场村的困难农民工何开学对记者说。老何身体有残疾,靠开摩的维持全家的生活。2008年,他的三个孩子到了读书年龄,在学费上却犯了难。经好心人指点后,他找到谢臻嵩帮忙。“这孩子我都收了,你就放心吧。”谢臻嵩一口应了下来,免费让三个孩子就读不说,每个月还掏出150元钱资助这三个孩子读书。

谢臻嵩的“行知精神”让人赞服。七小教师张海燕原来在乡镇一所公办学校教书,今年有机会可以调进县城更好的学校工作。在得知谢臻嵩的故事后,她主动要求调来七小。“可能这里的孩子基础差,比不上县城的好学校,但我觉得工作起来非常充实,从谢校长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行知精神’,让人赞服。”在全县教育系统只要提及谢臻嵩,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现在正给学校申请免费午餐,还要给学校的民办身份教职人员申请经费补助。”眼下,谢臻嵩正忙着这两件事。织金七小的农民工子女多,可偏偏是在城区办学,这样就没法享受国家的免费午餐政策。“学校的孩子们午餐吃的非常简单,我看着心疼。”今年的教师节庆祝活动,为了节省活动经费,他找到县工会的领导帮忙,准备借工会的办公场地,办在工会大院里面。

年逾古稀的谢臻嵩,依然在奔走……

打工子弟入读公办校到底难在哪?

北京一公办小学校长透露,信息不对称、学位紧张、部分学校挑学生、部分家长不上心等是原因

些,观念也开始转变了,现在片区内择校情况已经减少了许多。”

王玉春在感到欣慰之余,也显示出了对农民工子女的一丝忧虑。尽管像半壁店这样的普通小学在招生政策、理念等方面,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但农民工子女进入不少公办学校仍然存在隐性障碍。

仅“报名期内”和“手续齐全”这两项要求,对农民工子女而言就非易事。记者了解到,北京大部分普通小学一般只在社区、幼儿园和自家校门口发布招生通知,而这些地区大多不是外来务工者聚集区域,因为错过报名时间而无法报名入学的农民工子女不在少数。

农民工子女入学手续在日渐规范的同时也变得更为复杂、繁琐。今年,北京市小学要求家长在网上填报信息并进行信息采集,并

持“五证”到街道办或乡政府开具借读证,然后凭“七证”到学校报名。暂住时间不够,农民工家长没有缴纳社保、部分农民工子女因为超生而无法为孩子办理户口……一系列“硬伤”导致许多农民工子女被挡在公办学校门外。

面对五花八门的手续,农民工家长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有的家长,问要什么证,很快就给办好了。而有的家长,扭头就把孩子送隔壁民办学校了。”半壁店小学的招生老师对记者说,每当看见一双粗糙的手恭敬地递过一叠厚厚的证明材料,心里都会唏嘘、敬佩;而看见一些人拉着孩子就走,心里都替孩子可惜。

与一些家长对待教育的迥异态度相比,决定农民工子女能否入读公办校的更关键因素在于学校。

北京有限的教育资源,使得公办学校在招生时必须优先保证本地学生入学,其次才是外来务工者子女。今年,非京籍儿童报名比京籍儿童报名晚,报名后许多学校也并不承诺录取。这些增加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气氛的措施和做法,目的就是优先协调解决好本地生源的入学意愿。在政策上,那些由于学校名额已满而被拒收的农民工子女本可在区县招生办登记,由招生办统一协调解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学校报名点在拒收后并不会主动告知家长有关情况。一位负责招生工作的小学老师坦言,“学位紧张,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去找教委,我们不想给政府添麻烦。”

然而,有教委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北京市的教育资源并非紧缺到如此窘迫的地步,甚至有所富余。该工作人员介绍说,客观上,

北京市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一些位于中心城区的公办学校班容量仅在20人左右,完全有能力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教委也会把一些农民工子女调剂派位到这些学校,但农民工居住地大多集中在五环、六环,不可能把孩子送到二环的学校上学,更没有能力在中心城区租房供孩子居住。

主观上,农民工子女对学校教学质量影响较大,目前北京市公办小学每年要参加全样本检测,测试结果与学校绩效考核挂钩,许多学校因为担心招收农民工子女拉低检测成绩而拒收或只接收少量农民工子女。“有的学校其实根本没招满学生,也对外声称招满了,说白了就是挑学生。”今年,北京市小学又增加了体质健康检测,同样与绩效考核挂钩,农民工子女“个头小、发育不好”恐将成为又一个入学的隐性障碍。

本报记者 北梦原

“只要在报名期内,手续齐全的孩子,我们全部接收,如果学校名额已经报满,招生办会负责进行调剂派位,孩子可以去区内其他学位富余的学校上学。”日前,半壁店小学校长王玉春这样回答记者提出的“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校难在哪”的问题。

半壁店小学是公办小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属于典型的城乡接合部。王玉春向记者介绍,2008年以来,学校经过调研发现片区内本地适龄儿童数量大大减少,而外来务工子女数量却急剧增长,从那时起,学校就向农民工子女敞开了大门。目前,农民工子女占到学校学生人数的90%。在今年秋季学校招生过程中,半壁店小学接收了所有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今年招生数量比去年增加了近三分之一,报名人数满了还有几个家长领着孩子来,我们也都录取了。”

和大多数公办学校经历的状况相似,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学校使得本地居民对学校的教学质量产生了质疑和担忧。但这并没有改变半壁店小学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的办学思路,这些被本地居民视为减益因素的农民工子女也用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比城里孩子差。由农民工子女组成的学校艺术团办得风生水起,不少媒体和活动举办方都争相邀请他们进行表演。“本地家长看到这

批新的劳动大军,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频繁辞职、恶性上访投诉、打架斗殴、违法犯罪,甚至自残自杀……这些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更妨碍了社会稳定。而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所决定的。

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良好,但部分存在异常心理,业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觉压力按职务来看从大到小依次是生产工人、管理人员、业务人员、技术人员、行政干事。这可能主要与工种和工作环境有关。同时,男性幸福感高于女性,已婚者幸福感高于未婚者。

针对此现象,专家建议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教育,把制度层面、物质层面的关怀拓展到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通过多种形式,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努力,并让企业重视这个问题。同时,整合专家力量,帮助和指导企业建立并实施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辅助计划,设立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咨询机制等。

打工作家的故事 让我受益匪浅

黄田

我所在的公司每年要订阅省内外几十种报刊,但《工人日报》是我每日必看、爱不释手的报纸之一。在业余时间,我会细致品读、认真揣摩一些好作品,受益匪浅。

《工人日报》让我了解了许多打工作家。今年7月25日《农民工周刊》第7版刊登的《姜传富:打工仔圆了作家梦》,读后让我十分感动。记者写道:“为了写好《龙民》这部小说,他再一次背井离乡到北方、南方打工。在工地上,辛辛苦苦劳动一天,腰酸背痛,走进工棚,四仰八叉倒在床铺上,懒得动弹。朦胧中,忽然想起创作计划,一跃而起。工棚里十分吵闹,他只好到运河边,躲藏在芦苇丛里写作。芦苇丛里蚊虫特多,但进入状态的他,早忘记了疼痛。如果要写的东西比较多,就到工棚外的路灯下写。路灯亮的地方,人来车往,不安静;安静的地方路灯又不亮,他只好把地上的空烟盒拾起来,将锡箔纸拼接在路灯下,挂在胸前,补充亮度。有几次被路人看见,都说他是‘疯子’。我想,正是这种疯狂倔强的写作心态、顽强拼搏的精神、难能可贵的恒心与毅力圆了他的作家梦。这种边劳动边写作,对文学执着酷爱的精神,令人敬佩,催人奋发。

我十分关注《农民工周刊》刊登的新闻,特别关心还有哪些记者没有写过的有关农民工的新闻。2011年5月23日,我在《农民工专刊》首次发表了文章《浙江永康:农民工当选“作协”理事》。在此文中,我写了两个年轻农民工作家因创作成绩突出,当选永康市作协理事,这在全国是稀罕事。此文刊登后,许多打工文学爱好者纷纷给他们打去电话表示祝贺,同时向他们讨教写作上的成功经验和秘诀。这篇稿子刊登后的效果让我十分高兴。

近年来,我在10多家报刊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其中《难忘的留守儿童岁月》荣获“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今年4月28日,永康市作协举行首届“兄弟文学”颁奖仪式,隆重表彰了5位优秀作家,我是其中之一。

本报讯(记者吴锋思 通讯员黄儒青)“23.8%存在异常心理。其中强迫、人际敏感、抑郁和敌对是影响他们心理健康状况的主要问题。”厦门市集美区的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渴望“人情味”的温暖。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集美区委宣传部牵头多个部门开展了为期近1年的集美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研工作。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但融入过程比较缓慢。25.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本地人对他们比较尊重和很尊重,63.6%认为一般,还有7.4%的员工认为不被尊重,25.4%认为就业机会与城市人不平等。

厦门集美区调查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人情味”的温暖

- 男性幸福感高于女性
- 已婚幸福感高于未婚
- 业务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最低

这批新的劳动大军,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频繁辞职、恶性上访投诉、打架斗殴、违法犯罪,甚至自残自杀……这些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更妨碍了社会稳定。而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所决定的。

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良好,但部分存在异常心理,业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觉压力按职务来看从大到小依次是生产工人、管理人员、业务人员、技术人员、行政干事。这可能主要与工种和工作环境有关。同时,男性幸福感高于女性,已婚者幸福感高于未婚者。

针对此现象,专家建议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教育,把制度层面、物质层面的关怀拓展到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通过多种形式,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努力,并让企业重视这个问题。同时,整合专家力量,帮助和指导企业建立并实施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辅助计划,设立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咨询机制等。

吉林省放宽政策:农民工可以个人身份办理养老保险

新政实施月余 300 多名农民工参保

大多选择低档缴费标准,“完全靠自己缴费,希望少缴一点钱”

本报讯(记者彭冰 实习生郭佳)“以前,进城务工人员不能以个人身份办理养老保险,只能随企业参保,现在有了新政策,我们终于也能享受市民待遇了!”9月10日,在长春市打工已有10多年的农民工张春红,一边在市社保局办理参保手续,一边兴高采烈地对记者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使农民工在养老保险层面和市民享受同等待遇,

吉林省日前出台新规:凡年满16周岁,具有农村户籍,在吉林省城镇居住,从事个体经营、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以及灵活就业的农村居民,均可凭《居住证》或《暂住人口信息登记表》,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这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吉林省社保局城镇养老保险处处长陈长春告诉记者,农民工参保的缴费政策,参照该

省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灵活就业人员办法,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按照20%的比例缴纳年度基本养老保险费;同时,也可以选择以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或80%为缴费基数。

“农民工可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实实在在的好政策,也体现了社会的一大进步!”今年55岁的毛武营,一听到消息,就立马赶到社保局参

保,他告诉记者,由于对“将来政策是否调整”没有把握,他身边多数农民工目前还不敢“贸然行动”。

记者从长春市社保局个体分局获悉,该项新政正式实施1个多月以来,共有300多位农民工登记申请参保,其中多数人都选择了低档缴费标准,即以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已在长春务工30多年的韩近月对记者说:“如果按长春市目前

工资水平来算,缴费基数应是2314元,这样一年要缴费5553元,由于我们要完全靠自己缴费,所以,还是希望能少缴一点钱。”

“因为新政刚开始实施,很多农民工还不太了解,对此持观望态度,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前来办理养老保险的农民工肯定会逐渐增加。”长春市社保局个体分局副局长高玉梅表示。